

周建人的爱国民主活动

戴海荣

周建人是民进创始人之一，他的一生，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伴随在一起。

追随长兄 参与爱国民主活动

1888年11月12日，周建人出生于浙江绍兴周家新台门，两位兄长周树人（鲁迅）和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享有盛名。

周建人一直抱憾两件事：一是他没有赶上绍兴府学堂的考试，读中学。二是没有能像两位兄长一样外出读书，读大学。鲁迅理解弟弟的心情，鼓励他自学植物学，还特意从日本购买一些植物学书籍，寄回老家，鼓励周建人自修。

周建人受长兄鲁迅影响很大，从自学植物学，到从事爱国民主运动，走上革命道路，时常得到长兄的指导和帮助。

辛亥革命时期，作为反清文学团体“越社”成员的周建人和鲁迅一起参加了光复绍兴的斗争，成为一名革命民主主义战士。周建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，印象十分深刻。他写道：“当杭州光复的消息传到隔江的绍兴时，人心振奋，而绍兴府和山阴、会稽两县的衙门里都慌成一团，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，惶惶然好像丧家犬，把小辫子盘在头顶上，密谋对策。”

1919年，周建人和母亲随鲁迅迁居北京，在北京大学旁听科学总论和哲学等课程。1921年由蔡元培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，并在《东方杂志》《妇女杂志》等刊物上发表文章。周建人在继续从事编译工作的同时，与宋庆龄、蔡元培、鲁迅等一起，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，反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暴行，成为中国共产党可信赖的知心朋友。

在商务印书馆，周建人和共产党早期成员沈雁冰（茅盾）、杨贤江等人成为知心好友。1923年，经沈雁冰介绍，周建人认识了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。当时，瞿秋白刚从苏联回国，在上海筹备办上海大学，正在物色各系教员，当他得知周建人正在从事妇女运动，对生物科学很有研究时，便主动邀请他担任教员，讲述达尔文的进化论。瞿秋白学识丰富，精通外文，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。他启发周建人说：“无论从事什么工作，都需要科学的理论作指导，你可以看看马列的书，对工作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。”世人都把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传为美谈，却不知周建人与瞿秋白结交更早，关系颇深。

据周建人回忆，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，陈云也在该馆工作，任经理部经理，两人经常见面互致问候，也比较了解。周建人对陈云善于理财的才华非常欣赏，后来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：“陈云理财精明，富有经济头脑，他在商务时，时常要向总经理汇报账目，六七位的数字别人用心记也记不住，他可以一口气报得清清楚楚，一点不错。”

冼星海创作《黄河大合唱》

韩峰

1939年的除夕夜，延安西北旅社的一间宽敞的窑洞里，冼星海受邀与来自前线的抗敌演剧三队的同志们欢聚。当听到诗人光未然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写成的《黄河吟》时，冼星海按捺不住地快步上前，把诗作紧紧抓在手里，并自信地表示“我有把握写好它”。

冼星海并没有急于动笔，他没有光未然那样的亲身体会，他要从光未然和抗敌演剧三队那里了解更多更详细的战地生活，以及船工生活和高亢激越的船工号子。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，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旋律像酿酒一样在冼星海的脑海里发酵、蒸馏，终于，历时6天6夜的抱病创作，一曲气势磅礴、激昂豪迈的《黄河大合唱》，诞生在延安冼星海的土窑洞里。

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举行的《黄河大合唱》首演，冼星海为使演出阵容更强大，合唱队增加到100

与此同时，经沈雁冰介绍，周建人还认识了中共党员、松江女子中学校长侯绍裘，并应邀去该校演讲，宣传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思想，鼓励女生消除自卑思想，勇敢投身革命。此后，周建人经常往来于上海与松江之间，有时还和沈雁冰同行，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之下，松江女中不少学生懂得了男女平等和“自身解放不靠别人靠自己，全靠努力奋斗去争取”的道理，有的还参加了革命。

鲁迅定居上海后，兄弟两人共同战斗，成了亲密战友。此时正值大革命失败，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，鲁迅也受到监视，他与共产党人的交往和信件来往等，往往由周建人经手、转达和提供掩护，如瞿秋白给鲁迅的信就常常寄给周建人请他转交。有一段时间，瞿秋白在上海有时住在鲁迅家里、有时住在周建人处、有时则住其他地方，时常转移，住址是不公开的。1935年2月，瞿秋白在福建汀汀被捕，在监狱里化名“林祺祥”，分别给周建人与鲁迅写了求救信，周氏兄弟急忙通过蔡元培等人展开营救。从这件事可以看出，瞿秋白是把周氏兄弟作为最可信赖的同志和挚友来看待的。

在鲁迅的引导下，周建人还加入了“赤色济难会”、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组织，参与调查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迫害“政治犯”的罪行，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，争取言论、出版、结社、集会等自由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周建人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，和文化界进步人士一起，多次联名发表反对国民党投降政策的救亡宣言。还同文化教育界爱国知识分子组织马列主义读书会，团结进步人士，坚持民族解放斗争。

抨击独裁 参与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

抗战胜利后，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，周建人先后在生活书店、新知

书店担任编辑，从事进步文化事业。他深感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常撰文抨击国民党当局卖国、独裁、内战的政策。从1945年至1948年的4年中，周建人撰写的关于和平民主运动的政治文章，总数在百篇以上，其中很多都发表在《民主》周刊上。他既是这份刊物的编委，也是重要撰稿人。

以《民主》为阵地，周建人等一批爱国民主人士逐渐聚集在马叙伦周围，以他为首，参与各项爱国民主活动。这些活动又促成了上海爱国民主力量的融合，马叙伦、王绍鏊、周建人、徐伯昕、许广平、赵朴初等一批相互熟识、常常并肩战斗的爱国民主人士拟建立一个稳定的组织共同战斗。

经过周密的筹备，1945年12月30日，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召开。周建人出席了成立会议，后又当选为民进第一届理事兼理事。自此，开始参与民进组织的联合战事。1946年1月，周建人与马叙伦、严景耀、郑振铎等以中国促进会理事的身份，共同发表了《中国民主促进会给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书》，提出七点建议，要求“解决一党专政，奠定民主政治”。

1946年5月5日，民进与上海多家工会以及妇女、文化、医药、教师、学生等各界52个团体组织，共同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（简称“人团联”），周建人任理事。随后，民进联合“人团联”先后多次为争取民权民主、反对内战行动发声，如反对在上海实行“警管区制”，发起各界知名人士164人联名上书蒋介石、马歇尔、周恩来等呼吁停止内战，发起“六二三”反内战大会和组织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呼吁和平等，周建人均参与其中。

不畏强暴 在第二条战线坚持战斗

1946年6月26日，国民党政府进攻中原解放区，发动全面内战。与此同时，蒋介石集团进一步加强独裁统治，大肆暗杀爱国民主人士。面对这样的倒

中央领导来延安的宾客。毛泽东看完演出，兴奋地为这部难得的抗战作品拍手叫好，听说冼星海为创作这部作品用坏了不少蘸水笔，就将自己的钢笔送给了他。后来冼星海赴苏联，临行前，毛泽东还在家中请他吃饭，为他饯行。

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的李富春，听说冼星海为创作这部作品吃了不少白糖，想方设法解决了冼星海的吃糖问题。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为改善冼星海的居住条件，还专门给他拨出一孔窑洞；为方便他的生活，还为他配备了一名通信员；为增加他夜间创作的光亮，还送给他一筐蜡烛。

当周恩来回到延安看了《黄河大合唱》，赞赏之余为冼星海欣然题词：“为抗战发出怒吼，为大众谱出呼声！”来到延安的国共两党抗日将领、爱国华侨、外国客人及各界人士看到

行逆施，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广大群众开展了反对美军暴行，反对蒋介石政权内战、独裁、卖国政策的爱国民主运动，建立了第二条战线。周建人和民进同仁积极参与到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中去。

1946年7月19日，周建人、许广平、郑振铎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出电函，要求联合国派调查团来华调查“李闻惨案”。随后，周建人也参与了反对伪国大、伪宪法和改组伪政府的斗争。同年8月和10月，代表人民呼声的进步刊物《周报》《民主》相继被国民党当局查禁。10月10日，马叙伦、王绍鏊、许广平、周建人、郑振铎等39人联名发表《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》一文，强烈抗议国民党当局扼杀人民的言论自由，指出“人民的口是终归封锁不住的，文化是终归虐杀不了的”，并呼吁“全体人民一致起来争取人民所应有的自由的权利”。

1948年6月，周建人、郑振铎联合上海文化界人士114人发表了《正告美大使书》，指出我国的反美扶日运动“是民气昂扬、舆情激愤的具体表现，完全合情合理”，他们正告司徒雷登：我国的“独立主权不容任何人侵犯，爱国自由不容任何人干涉”！

强权和暴行非但没有吓退周建人，反而使他更坚定了对光明的向往。1948年4月，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，周建人由他的老战友、老党员艾寒松介绍，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遵照党的指示，为了有利于他在国统区的活动和斗争，周建人一直没有公开过自己的党员身份，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也不知道。同年秋，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，周建人一家自上海转天津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，受到中共中央领导和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。随后，周建人被任命为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继续为建立一个独立、富强、自由的新中国而不懈奋斗。

（本文作者单位：民进中央宣传部）

《黄河大合唱》后，无不赞叹。美国记者斯诺写道：“在《黄河大合唱》演出散场时，我和毛泽东一起走了出来。他问：‘你觉得怎样？’‘好极了。在燕京大学听唱《弥赛亚》以后，这是我在中国听到的最好的大合唱了。’”

当《黄河大合唱》的乐谱传到美国，普林斯顿大学合唱团开创了用英文演唱的先河。20世纪最伟大的男低音歌唱家保罗·罗伯逊，还在联合国成立庆祝大会的舞台上，用他浑厚深沉的嗓音唱响了《黄河颂》。在莫斯科，在日本，在加拿大，在旧金山，在芝加哥，在哈萨克斯坦，在新加坡，在澳大利亚……几十个国家都先后响起了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歌声，即使跨越了几十年的时空，《黄河大合唱》仍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激荡。

在苏联为大型纪录片《延安与八路军》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期间，冼星海在《黄河大合唱》的《创作札记》中写道：“一个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成功在我不算什么，我还要加倍努力，把自己的精力、自己的心血贡献给伟大的中华民族。我惭愧的是自己写得还不够好，还够不了群众所要求的量！因此我又写了第一交响曲《民族解放》和其他作品，但我还要写，要到我最后的呼吸为止。”

文人轶事

钱锺书与陈寅恪是当今同被誉为学问渊博的两位大师。陈寅恪在学校任职时间久，据他的弟子回忆，曾出过一个“孙行者”上联，要求学子对出下联的题目，引得时人异见纷纷。记录虽有“王引之”“祖冲之”“胡适之”等多个对应答案。

学问渊博、识见不一般的人物，出的题目特殊，可以理解。钱锺书也同样海量阅读，同时有极佳记忆，他也任教数年，不知有无为人注目的考题留下来？近日读书，竟然真见到学人回忆中的钱锺书考题。虽然不是陈寅恪那么显著特殊，不过对于考生来说，还是非同一般的。

上海复旦大学的王水照教授，大学毕业后一段时间，与钱锺书同在文学研究所工作。20世纪60年代初，钱锺书第一次准备招收研究生，王水照的一位北大同学打算报考，心里不踏实，便托王水照问问钱锺书应该阅读哪些参考书。钱锺书回答：用不着什么准备，准备也没有用。由此看来，题目应该在考

文人轶事

老舍待人真诚、厚道，细致入微。他很好客，每天下午，家里来访的客人不断。作家、画家，戏曲、曲艺演员等，老舍都以礼相待。

每年，老舍要把北京市文联的同仁约到家里聚两次。一次是菊花开放的时候，赏菊。一次是腊月里他的生日。酒“敞开供应”，客人随意，能喝多少喝多少。菜都是老舍亲自掂配的，他有意叫大家尝尝地道的北京风味，有一次用一瓷钵芝麻酱炖黄花鱼。老舍家的芥末墩也非别人家可比。有一年，他特意订了两大盒“盒子菜”。直径三尺许的朱红圆漆盒，里面分开着干酪，装的是火腿、腊鸭、小肚、口条之类的切片，都很精美。熬白菜端上来了，老舍先举起筷子：“来来来！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！”

老舍对文联干部很了解，他不看档案，也从不找人“个别谈话”，只是从平常的谈话中了解一个人的水平和才气，比看档案要准确得多。他爱才，对有才华的青年“平生不解藏人善，到处逢人说项斯”，不乏溢美之词。老舍平易近人，没有一点架子，他和下属的关系不像上下级，更像是

文人轶事

1937年，19岁的吴祖光在国立戏剧学校任校长秘书兼教员。一天，他收到父亲来信，随信附一本《东北抗日义勇军烈士苗可秀传略》。父亲让他考虑用这份素材写一个话剧。费时四个月，吴祖光写出一个四幕剧。因苗可秀最后被俘于凤城县，当地人称凤凰城，便借作剧名。他把《凤凰城》交给同校任教的曹禺。曹禺看后很高兴，说这是一部好戏，立即让校友剧团抓紧研究和排演这个剧本。

《凤凰城》于1938年秋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演，正好两个剧中人来到重庆。一个是王卓然，苗可秀母校东北大学的校长。另一个是赵侗，苗可秀牺牲后继任的东北青年铁血军司令。两个剧中人都参加了首演式，演出十分轰动。后来，《凤凰城》成为抗战时期演出场次最多的戏，演遍全国及东南亚未被日寇侵略的地区。1939年1月，邹韬奋创办的生

文人轶事

相声大师侯宝林与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相交甚好，华罗庚曾戏言，侯宝林若不说相声而是学数学，相信一定不赖。

一次，两人在一起聊天。华罗庚对侯宝林说道：“我特别喜欢听您的相声。相声我是外行，但是，你要是数学问题，可以来找我。”侯宝林说：“华先生，那我向您请教一个数学问题。”“没问题，您说！”“2加3在什么情况下等于4？”正当华罗庚默默思考时，侯宝林又强调说：“请注意，我问的是在什么情况下！”华罗庚沉思良久，最后叹息着摇了摇头。侯宝林见状笑着说道：“哈哈，在数学家喝醉了的情况下呀！”华罗庚听了不禁开怀大笑：“好一个幽默大师，竟拿我取乐！”

华罗庚知道侯宝林在开玩笑，于是，也想难一下这个聪明的朋友。他说：“我腿脚不方便，请您帮我去买一斤橘子汁，顺便再捎一包炒米花

钱锺书的考题

杨建民

考试之后，王水照在帮着钱锺书阅卷时，看到了这样一些考题：试卷上抄录了若干首无作者名的诗作，要求辨认出它们是学习唐宋哪些大家的风格；抄录了白居易的一首代表作，要求指出其中有否败笔，为什么是败笔……前一题得把唐宋大家的诗作吃透，广泛阅读是基本，能够体会他们的作品优长，对他们的风格能够辨析，这要求绝不低；第二题有意思，白居易是大家，抄出的又是代表作，可不叫你评它好，而是挑毛病，不仅指出“败笔”，还要说为何是“败笔”。这又考验了学子的鉴赏审美能力，同时打破了一些盲目崇拜名家，不敢碰触名家问题的观念。

据王水照回忆：答卷中居然有人大谈白居易这首代表作的思想特点一二三，艺术成就甲乙丙的。紧张得题目都没看清，并且照着当时一般的套式作答。我们阅读钱锺书才明白，他是最要打破这种“套式”的。

真诚待人的老舍

崔鹤同

前辈与后辈，这让大家感到很舒服。身为北京市文联主席，除了处理日常的公务，老舍常常想到一些别人没有想到或想不到的问题。

新中国成立前北京有一些盲艺人，他们沿街卖艺，生活维艰。老舍就设法把这些盲艺人组织起来，使他们生活有出路。为了引起各方面的重视，他把盲艺人请到文联演唱了一次，还特请两位老艺人翟少平、王秀卿唱了一段喜剧性的牌子曲《当皮箱》。

北京有一座智化寺，寺里的和尚演奏的古乐不同凡响，他们用管乐器演奏唐代的“燕乐”，所用乐谱别人不能识，记谱的符号不是工尺，而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笔道。老舍就把这些他们请来演奏，音乐界的同仁对这堂活着的古乐都很感兴趣。

老舍极看重齐白石，他们也是至交。白石老人家里人口多，每天煮饭的米都是他用一个香烟罐一下一下量。有人曾提出把老人接出来住，这么大岁数了，不要再操心这样的家务事了。老舍知道了，给拦了，说：“别！他这么着惯了。不叫他干这些，他就活不成了。”老舍的心里总装着别人，正像他的字“舍予”，“舍弃自我”，人如其名。

吴祖光拒绝剧作再版

刘浪

生活书店在重庆出版了《凤凰城》初版本。有人曾向吴祖光请教，何以年纪轻轻就能写出《凤凰城》，取得巨大成功？吴祖光很谦虚，答道：“我的总结就是四个字：投机取巧。”他进而解释说，投机，投全民抗战之机；取巧，取当时剧作家们还未及写出抗战题材剧目的巧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戏剧出版社的编辑陈北鸥多次拜访吴祖光，希望再版《凤凰城》，他都拒绝了。他说：“这个剧本写得幼稚，今天一看会教我感到脸红耳赤。譬如剧中苗可秀离家出征带着义父张生，直到他殉国死难，完全是旧戏里公子随身的书童那样的主仆关系……现在连我自己也看不下去。”

正是源于这种对自己创作谦虚和认真执着的精神，继《凤凰城》后，吴祖光又写出了《正气歌》《风雪夜归人》《牛郎织女》《林冲夜奔》等诸多名剧，为我国现代戏剧史留下了丰富遗产。

侯宝林巧胜华罗庚

周惠斌

来。这是4毛4分钱，贵了我不要，少了我可不依。”侯宝林心想，4毛4分钱正好够买一瓶一斤装的橘子汁，一包炒米花还需要4分钱，这多出来的钱找谁要去？总不至于自己垫付吧？看来这是数学家想难为我。

侯宝林拿着钱出了门，边走边想……突然，他拍了拍脑袋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对啊，四舍五入呀！”很快，侯宝林就回来了，他把一斤橘子汁和一包炒米花交给了华罗庚。原来，当时的国营商店采用四舍五入制，侯宝林走了10家食品店，每家只买1两，4分4厘1两，四舍五入，买1两仅花去4分钱，10次下来，整瓶一斤的橘子汁共用去4毛钱，而剩下的4分钱刚好买一包炒米花。就这样，他用这个方法把橘子汁、炒米花都买来了。华罗庚心悦诚服地对侯宝林说：“嘿！太聪明了！我得拜您为师！”这段“侯宝林巧胜华罗庚”不久便在北京流传开来。